

习仲勋与关中特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 黄拴锋

1936年9月,在红军西征取得辉煌胜利的条件下,中共中央再次派习仲勋返回关中地区,任关中特委书记,开展恢复关中特区工作。在返回关中特区之前,习仲勋按照中央的安排,参加了著名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会后,首先在淳耀县槐庄子主持召开会议,恢复了关中特委和特区政府。随后,习仲勋又在赤水县的七界石召开了关中特区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和恢复关中各县区政权问题。“七界石会议”后,关中特区的“围剿”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重点是恢复各种秘密组织和建立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习仲勋的正确领导下,关中特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各方面的工作都得到了顺利开展,各地的地方武装力量迅速发展起来。仅一个月时间,全特区的游击队发展到14支,500余人。其中,半数是新成立的,国民党反动派虽然对关中特区又组织了一次“围剿”行动,但迅速被地方武装击败。经过新正的前马塬、赤水的郭家掌、淳耀的让牛村等几次大规模的战斗,敌人龟缩在据点,再也不敢外出骚扰。同时,习仲勋领导关中特区党政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统战工作,针对敌军的不同情况,灵活采取不同的办法。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游击队向他们宣传“打到东北去,收复家乡”“一家人不打一家人”等抗日号召,教育国民党军的官兵以民族利益为重,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对马鸿逵部队的官兵,游击队则按照回族的的风俗习惯,将被击毙的马部官兵集中起来,送到新正县的两个回民乡,由清真寺阿訇对死者按回族习惯埋葬;对被俘人员,在进行了抗日救国宣传后,每人发给路费10元,送回原部。这些工作对敌军的震动极大,使国民党保安队不断分化瓦解,有的向游击队缴械投降,有的逃离苏区,有的与红军游击队签订停战协议。

习仲勋在领导关中特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非常注意斗争策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不断扩大统战对象,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新正县二区雷庄村张治平是一个长期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深知民间疾苦,同情贫苦农民的德高望重的名医。习仲勋在开辟新正县革命根据地时,就和他有了交往,以后通过不断的接触,他俩成为朋友。在习仲勋的影响和教育下,使他由共产党员身上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希望。而后他在行医过程中,积极宣传、动员群众筹集粮款,掩护革命干部,一直暗中中共保持密切的联系,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张治平被选为新正县和陕甘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在他的带动下,他曾在几处张治平,善于张化民先后参加革命。张治平曾给“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张治平题词。

1945年11月27日张治平逝世后,习仲

勋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及西北局书记高岗送了挽联,高度评价他的革命功绩。清末民初,活动于新正县一带的土匪、盗贼多系哥老会头目,当地群众为了免遭匪患,很多人参加了哥老会。习仲勋了解了这一情况后,采取争取、瓦解的方法,与马栏街哥老会龙头大爷杨某交朋友,向他宣传党的政策,晓以大义,使其改邪归正,以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从敌军哥老会人员中探取了重要情报。

“西安事变”发生后,习仲勋在参加了“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回到了关中特区,召开了关中特区各县、区委书记会议,传达了会议精神。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方针,习仲勋对关中的具体工作作了新的部署,及时调整根据地内部的各种组织,将苏维埃政府改为抗日救国政府,取消了共青团,成立青年救国会;取消了贫农团,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等广泛的群众组织,停止扩大苏区和打击国民党军。为了保证转变政策和调整组织工作的顺利进行,关中特区对干部开展以转变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形势教育和政策教育,针对干部群众存在的许多思想问题做了耐心细致地教育工作,保证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执行。

习仲勋为了宣传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增进各界人民对红军基本政策的了解,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活动,发动关中特区各级地方党政组织和红军主力一道组成流动宣传队,深入山区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采取边宣传,边肃清匪患的方式,开展减租减息工作,使群众认识到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爱护老百姓,是真正的为穷苦人谋利益的,诚心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群众觉悟后,纷纷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从中涌现了不少积极分子,党组织吸收他们入党或参加红军,进一步壮大了抗日队伍。同时,习仲勋和关中特委还利用红军主力进驻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时机,在国民党管辖区开展建党工作,采用派员运干部开展救亡运动,建立地方组织等方式,培养革命干部骨干,建立和壮大党的队伍。当时,习仲勋和关中特委开展工作的主要区域是新正、宁县、合水、旬邑、淳化一带,先后在上述地区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扩大了党的影响。其中,关中特区和红军在宁县建立了中共官河支部、早胜支部,在新正建立了中共纪纲党支部等。到1937年上半年,在关中特区周围建立了中共合水县委、中勋旬邑县委和宁县工委,扩大了革命影响。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

一线战的初步形成,为消除红白对立的局面创造了条件。习仲勋及时组织和领导关中各县积极与国民党地方当局沟通联系,在各县开展划界谈判工作,分别划定了各自管辖区的界限。为了指导这项工作,习仲勋还派出关中特委统战部长杨毅泉参与了各县的划界谈判。

新正县与国民党新正县的划界谈判是在1937年3月进行的,新正方面的代表是郭廷藩、杨毅泉,国民党新正县方面代表是其县长朱门、教育科长巩保初,并邀请驻新正罗川的红一师政委邓华和国民党平凉党部书记长为评判人员。谈判共进行了三轮,在谈判中,新正方面代表以抗日大局为重,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在有原则、有条件的前提下,作了必要的让步,将已建立区乡政权的长乐原区(即新正红五区)让出。经过新正代表的艰苦努力,双方最终达成了划界协议。协议规定:新正县与国民党新正县辖区的界限是,南起杨家畔、解家川、半川、上南坡头以东,北起西五畔沿沟以西为两县分界限。划界后,新正县辖5个区,28个乡,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人口3万4千余人。

在此前后,新正、赤水、淳耀等县也经过多次谈判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了划界协议。关中特区的划界斗争获得了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促进了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和发展,为关中特区的革命政权赢得了宝贵的和平,为红军主力出师华北敌后抗战,建立了巩固的战略后方基地。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时,关中特区的的新正、新宁、赤水、淳耀等各县均属八路军的后方,军民协作,相安无事,前线之军心赖以维持,后方之团结赖以树立。

为了进行抗日战争的准备,扩大红军,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中央军委在1936年12月发出指示,要求利用一切机会扩大红军。习仲勋和关中特委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号召各县把扩大红军作为重要工作,积极动员贫苦农民青年参加红军。

1937年2月,关中特区的的新正、新宁两县的所有地方游击队被编为关中第四游击大队,全大队共400人。3月,第四游击大队在富平补充到红四师中去,扩充了主力红军。总之,“西安事变”后,习仲勋和关中特委经过半年的艰苦工作,使关中特区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移,为抗日战争做了必要的组织、思想和物资准备。同时,习仲勋和关中特委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动了各界人民群众,掀起了关中特区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关中特区抗日统一战线局面的形成,使之与陕甘宁边区的其他地区一起,最终成为八路军敌后抗战的战略后方。

1946年8月,为配合中原解放军的突围,刘伯承和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也就是群众常说的刘邓大军),发起陇海战役。陇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刘邓大军5万多人撤往鲁西南,蒋介石急忙从郑州和徐州调集30万大军,兵分两路,像一把钳子朝鲁西南杀来,妄图倚仗优势兵力将刘邓大军消灭在鲁西南。

刘伯承、邓小平面对这一险峻形势,分析认为,如果不在鲁西南同国民党军队作战,对军队下一步战略非常不利。于是,刘伯承和邓小平便谋划着“枪打出头鸟”,给他们点厉害尝尝。

在国民党军钳击之势的西线集团中,整编第三师是唯一主力,该师中将师长赵锡田是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赵锡田自恃是中央军,装备远远超过对手,根本不把刘邓大军放在眼里,吹嘘“不用两星期就占领鲁西南”。同时,一贯骄横的赵锡田平时既不尊重自己的直接上司——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又不注意同友军协调关系,一心只想独吞战功,因而常常孤军深入。而此时,刘伯承和邓小平也把目光盯向了计划向定陶方向进攻的整编第三师这只“出头鸟”,精心筹划了定陶战役方案,并上报中央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

消灭第三师的关键,是引诱他们进一步孤军深入,以便同其他国民党军队割裂开来。大战前夕,刘邓首长精心策划了一个“减灶计”。所谓减灶计,就是军队做饭用的灶具一天比一天减少,给敌人造成自己军队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的错觉。大家都知道,战国时期的孙臆用此计谋,庞涓最后搭上了性命。此后,我军前线指战员便按照刘邓首长的吩咐,边打边撤。整编第三师占领我方阵地后,就会看到不少残留的武器和装备,甚至还有许多来不及运走的粮车。赵锡田先是很吃惊地说:“共军过去作战是很少丢弃武器和粮食的!”继而,他就很自信地说:“这说明刘伯承已经溃不成军了!”因此,他便命令部队继续孤军追击,逐渐同其他国民党军队拉开了距离。

9月3日,当整三师的主力前进到定陶西南25公里的大杨湖村一带时,刘邓首长发现他们同其他国民党军队的距离至少十公里,认为时机已到,果断下令打响了定陶战役,整三师的1万多人马被刘邓大军的5万重兵重重包围了起来。

直到这时,赵锡田才发现中计了。他急忙呼叫友邻部队支援,然而他们都在叫苦:“我们遇到共军顽强阻击,无法前进。”其实,阻击他们的大都是鲁西南军分区和各县的地方武装。正如刘邓首长处初估计的那样,整三师从上到下平时骄



刘邓大军奋勇赢得定陶大捷

人民解放战争的开篇战

□ 王贞勤

横,其他国民党杂牌军都巴不得看他笑话。

赵锡田没有办法,先是下令部队坚守待援,等到手下的几个主力团接连被消灭后,又下令丢弃阵地往南逃跑,被刘邓大军紧紧追赶,不久又被包围了起来。绝望的赵锡田发现突围不成,就脱掉将军服,躲到一辆汽车下面。不大一会儿,解放军过来打扫战场,把他从车底下拽了出来。

被带到刘伯承邓小平面前后,赵锡田不解地问:“你们从一开始就一路撤退,辎重粮食丢得遍地都是,难道是在骗我?”刘伯承笑着说:“你读过兵书,应该知道孙臆减灶赚庞涓的故事!这不,我们丢掉的粮食、辎重等物资不都又回来了么?”一句话说得赵锡田满脸通红。

定陶一战,刘邓大军歼敌4个旅计1.7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钳型夹击美梦。从此,刘邓大军在晋冀鲁豫战场上完全取得了战略主动权。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9月12日发表了《蒋军必败》的社论,高度评价了定陶战役等“对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到了扭转时局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也将定陶战役誉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光辉范例”,在多篇著作中都做了引用。

古代的军事重地——秦一号兵站

□ 师正伟

秦一号兵站遗址位于211国道陕甘交界0公里界碑东南方1公里处的甘肃正宁县中湾林场南侧的大古山梁上,地处子午岭南部的最高峰,海拔1756米,地势居高临下,气势宏伟。地形北窄南宽,形似葫芦,南北长450米,宽150米,东、西、南三面面临沟,北面依山,当地人称40亩台,北面只有30米宽的出口紧贴秦直道,形成天然屯兵营地,总面积7000多平方米,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据《正宁史话》记载:“秦代,兵站关城设南北二门,一层为门洞,二层为门楼子。东、南、北有土夯筑成的围墙,西面依山势削土代墙。关城内最高处是轩辕黄帝升天峰,峰下削挖窑洞20余孔,供驻军守关之用。”



1986年全国文物普查中,考古工作者在兵站遗址发现了用姜石铺成的院落地面和夯土墙基、素面方砖,几何纹路与绳纹方砖、瓦等十四种建筑材料。同时还发现了石窟寺群和瓦椽秦墓。这些都是我国首次发现。石窟寺里13处壁画栩栩如生,彩绘则色泽透亮,白描亦线条清晰。瓦椽秦墓的椽室全用板瓦和筒瓦筑成,墓内尸骨无存,但有一对玉鹿,一对玉龙和一个纹饰细腻的玉璧,色泽依然纯正。墓内出土的一个黑底间有红线的木质漆盘,虽然木已全腐,但漆层结成的外壳完整无缺,足以表明秦代涂漆艺术之高。从瓦砾散布的面积和残瓦上的标记看,其兵站规模恢弘,可屯兵数千。

秦一号兵站不仅是古代北拒胡羌,南屏京畿

的重要关隘,更是沟通东西的战略要地,也是秦代大将蒙恬调兵遣将、运筹帷幄的雄关。以后汉、唐、宋、元、明各朝各代在此治兵驻守沿用至清初废弃。如果你沿着树荫遮蔽的秦直古道向甘肃正宁方向行进大约5千米,可以看到路边有一个仿秦时关隘造型的木门,门的左侧悬挂着“明兵马巡检司”木牌。离门不远处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调令关巡检司”,碑的背面还有这样的文字:“据明《庆阳府志》记载,明初朝廷在这里设调令关巡检司,驻军35名,其中弓箭手20名,辅司兵10名,膳食管理服务4名,游击将军1名。据考察在关内土窑和院中,发现有秦汉时期的陶罐瓦片和元、明、清时期的碗、罐碎残物,而且大部分已被烟熏成黑色,证明历代常驻兵丁无疑。”

秦一号兵站是秦直道上的军事重地,是秦朝繁荣强大的重要保证。公元前212年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为抵御匈奴南侵,派大将蒙恬循子午岭主脉修筑了一条“高速公路”——秦直道。起点今淳化县北,终点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全长700多公里。直道的修筑贯通,与长城呈“丁”字相交。横有秦长城,纵有秦直道,互为依托,共同构成了秦帝国北部边疆重要的防御体系。凭借这一通道,秦始皇的铁甲兵,从淳化林光官屯兵地出发,粮食和军需源源不断地北运,3天3夜就可抵达阴山脚下,摧城拔地、所向披靡,从此匈奴“人不敢南下牧马,士不敢张弓报怨”,远遁大漠戈壁深处,数十年不敢露头。秦一号兵站的设立无疑对确保秦直道的畅通无阻,抵御匈奴的犯边,起到了功不可没的强大威慑力。

2012年9月,甘肃省正宁县在秦一号兵站古遗址附近恢复新建了以防火瞭望、旅游观光为一体的仿秦式烽火台一座,海拔高度1760米,占地面积近4000平方米,塔高五层共20.8米,建筑面积479平方米。成为调令关森林公园的主要景点之一,是瞭望关隘、坐着日出、眺望云海、倾听松涛,欣赏调令关林海风光的最佳去处。

珍赏



清竹雕福禄香薰

□ 李莹清



“官身常欠读书债,禄米不供沽酒资。这是宋代诗人陆游的诗句,描写的是他在书斋中焚香静读的情景。可见,终日与青灯黄卷相伴的古人,要用香薰来焚香净化环境、驱除蚊虫、提神醒脑。

香薰,又名熏炉或香炉,是古人熏香时所用之器。汉代之前,香薰主要是用青铜和陶制成,《艺文类聚》卷七十引汉刘向《熏炉铭》:“嘉此正器,嶰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结,朱火青烟。”汉代以后,香薰的材质逐渐丰富起来,有瓷、银、铁、竹、木等材质。其形状也多种多样,有圆形、方形、花瓣形、宝塔形等。宋代出现了瓷制的博山炉,但是它禁不住香粉的烧烤,很快就变成了文人的把玩之物。谢惠连《雪赋》中有“燎熏炉兮炳明烛,酌桂酒兮扬清曲”的歌吟。以后出现的玉质香炉、翡翠香炉等等,也都

是一种用来陈设或者把玩的观赏品。

藏友最近入手了一只清代晚期的老竹雕福祿香薰,黃褐色,香薰口呈海棠花形状,包浆厚重自然。它由炉盖和炉身两部分构成,子母口。炉盖顶部呈扣子状,中间凹处镂空雕刻缠枝花纹,外侧浅雕一圈如意纹,盖身有四面开窗,上面对称雕方胜纹和缠枝花纹;炉身也有四面开窗,其中一面镂空雕刻一只被弯曲勾连的丝带衬托的葫芦,另一面镂空雕刻着被丝带环绕的犀角和书卷,其它两面皆为祥云烘托的同圆方胜纹。整只香薰器型典雅优美、小巧玲珑,因其镂空较多,当香薰腹内燃烧香料时,香雾可以通过孔洞袅袅冒出,让人神清气爽,如临仙境。这只香薰上的纹饰,也颇有讲究。葫芦读音似“福祿”,常用于祈福,祈求富贵绵延;犀角自古就被当作避邪的灵物;书卷代指金榜题名;方胜纹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吉祥纹饰。把这几组纹饰组合在一起,其寓意不言而喻。

